

我们时代的

领袖

张 剑 荆 / 著

危机

THE CRISES OF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海 南 出 版 社

序 理性应成为时代的共识

马立诚

自海湾战争以来，国人对于世界事务兴趣大增，自坊间到沙龙，人人聚而谈之。这是中国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报道国际事态的《环球时报》成为最畅销的报纸就是明证。上网看看，各样的国际评论更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然而，究竟怎样理出个清明的头绪来，却还要费些功夫。

有人著书反对全球化。他们说：WTO 是一个灾难，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阴谋，是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全球化是第三世界“发展的陷阱”，终将葬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实行“光荣的孤立”。最近，类似著作连篇累牍，得到喝彩。还有人说“和平与发展”是个梦呓，美国正研制基因武器企图消灭中国人的人种，中国应该准备与老美决战，采取有组织的贩毒、细菌战、黑客等手段。当前亦可以不顾一切盗版，“偷死微软”。不用说，这些言论都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一般人读来都觉得困惑。

那么，我希望大家有空看看张剑荆的这本《领袖危机》。

集子中的国际评论大部分先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时用了个耐人寻味的笔名——东方更夫。我在报上看了

两三篇，就被它吸引住，以后很少放过。《中国经济时报》国际版篇幅很小，想用新闻与大报争雄很难，不过东方更夫的评论为它争取了读者。一是文章切中世界热点，比如印尼排华暴行、科索沃危机、大宇公司崩溃、叶利钦辞职等等，都作出及时的反应；二是文章生动活泼，据实直言，鞭辟入里，在哲理中投射出激情，完全没有当下某些国际评论那种僵化的八股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文章排除了矫情和虚张，充溢着求实精神和健康理性。比如《这是哀伤的时代》一文论述东亚金融危机，指出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基础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新现实”，一是裙带关系，二是腐败，三是信息不透明。这样锐利的眼光和反求诸己的探求精神，使我们感到，在一片浮躁的叫嚷声中，毕竟还有清明的理性。而这，正是中国在世界中争取应有地位的希望。

不用说，在这本书中，对于困惑人们的诸如全球化和盗版等问题，都有切中肯綮的分析。剑荆认为如今全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每个国家都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诚哉斯言。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目前不过是加速而已。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是靠着主动改变自己融入世界并影响世界的。生于今日世界而欲拒绝全球化，岂非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至于盗版问题，书中更有一语中的论述。剑荆认为，此乃小农流氓投机取巧陋习，看似得逞一时，实则给中国带来长远的伤害。

我认为，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不独给中国思想界增添了理性的声音，而且对于国际评论这个品种也是一种拓展和创新。

更夫的职责是打更。打更除了报时之外，还有警醒的作用。我们东方，需要有这样的“更夫”。

目 录

马立诚 序 理性应成为时代的共识 / 1

旧亚洲的终结 转型期的统治危机

评东亚的统治危机 / 3

这是哀伤的时代——评金泳三、苏哈托及桥本的下台 / 13

排华暴行：印尼分裂的开始 / 22

向苏哈托体制告别 / 26

瓦希德：在火山口上 / 33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争 / 37

李光耀：改变治国方式 / 47

亚洲的断层线 / 62

安瓦尔炸弹？ / 75

安瓦尔的阴影 / 79

从亚洲到伦敦 / 84

金大中：旧韩国的终结者 / 87

给全斗焕上历史课 / 91

韩国模式曲终人散 / 93

惶恐不安的日本大企业领导 / 99

提防日本式的陷阱 / 104

亚元乌托邦 / 108

评悉尼奥申委行贿 / 112

转轨的焦虑 前仆后继的俄罗斯政坛

普京与寡头——转轨国家的一面镜子 / 119

“这不是我的性格”——评叶利钦辞职 / 131

适时淡出的“住院” / 136

向后叶利钦时代过渡 / 140

俄罗斯领袖与“亚细亚复辟” / 145

黑色的政权 / 150

俄国：继续解体？ / 155

新总理 / 159

放弃帝国意识 / 162

巴尔干：难以承受之重 / 165

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卷入科索沃？ / 169

挑战者 在危机的烂泥中

米洛舍维奇及其洞穴 / 177

科索沃，在历史的烂泥中 / 188

科索沃危机与联合国危机 / 192

放弃血的思维 / 196

科什图尼察的选择 / 200

萨达姆的新手段 / 204

总统与扈从：看藤森出走日本 / 207

领袖危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 从美国总统选举看领袖危机 / 215
- 克林顿：拉链门与绞肉机 / 220
- 克林顿主义的背后 / 223
- 评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 226
- 新战略制定者播下的危机 / 230
- 评美国的“海外平衡”战略 / 233
- 全球化及其不满 / 242
- 西方国家形成新经济共识 / 246
- 达沃斯论坛的追随者 / 250
- 美元使臭味自动消失：评科隆债务计划 / 254
- 被遗弃的非洲 / 258
- 生态灾难：无法回避的课题 / 261
- 是时候了 / 266

附论 我的世界观

- 我们正处在领袖荒原上 / 273
- 另一种匮乏 / 289
- 驳知识共产论 / 295
- 迎接更加开放的新千年 / 301
- 大饥荒专家的草根情结 / 307
- 1998 年的五条箴言 / 310
- 知我者谓我心忧 / 316



旧亚洲的终结 转型期的统治危机



评东亚的统治危机

就领导人都无法有效治理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印尼的统治危机与发生在菲律宾的统治危机是有相同之处的。两位领导人都面临着失去权力的危险。他们都被媒体冠之以“经济泻药”的称呼。

尽管东亚国家自 1997 年以来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人们一般对于东亚国家确实创造过经济奇迹并不怀疑,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而对于这一奇迹的解释中,基本上有一个称得上共识的看法,就是这些国家建立起来了一个强政府,并且推行了一项有效的政策。在此问题上,世界银行的解释最为权威。世界银行在 1993 年的报告中提出,东亚国家政府为了解决合法性问题,推行了一套“分享增长”的机构和政策,虽然世行对这些政权的专制性质有所保留,但是仍然指出:“与其他绝大多数经济的独裁者不同,他们运用权威是为了更好地把工商、劳工和官僚机构组织起来,统一思想,共同追求发展”。

世行的辩护并未否认这一事实,即东亚国家建立了威权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

这一看法可以解读为东亚经济奇迹是在克服了统治危机后取得的成就。

东亚经济体统治的稳定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政治上是一

党制；其次，通过控制军队，确保了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最终控制；第三，政府执行了旨在保证增长的政策，比如这些经济体都审慎而微妙地处理与劳工的关系，限制工会的权力，抑制劳工激进主义。

然而，199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仅使东亚的经济结构陷于瓦解，同时其政治结构也面临严重挑战甚至崩溃了。

在经济危机基本上得到抑制的2000年，东亚的政治仍然处在混乱状态，尤其是印尼、菲律宾、中国台湾。鉴于中国台湾属于中国内部问题，因此，本文仅考察印尼和菲律宾的统治危机问题。

印尼：瓦希德总统在困境中改革

1999年10月，瓦希德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以他为主席的穆斯林教师联合会并不是第一大党，因此他的当选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也许，他之所以成为总统，归功于他是印尼极少数干净的政治家。苏哈托垄断权力长达32年，他的党汇聚了大量的政治精英，而在长期执政的专业集团党之外，虽然不乏有识之士，但毕竟长期远离政权缺乏执政经验和足够的人才。苏氏政权的突然倒塌，无疑形成了权力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瓦希德被选择出来担任领导国家的重任。

这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国家。在经济上，印尼遭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在苏哈托执政的最后阶段，印尼爆发了针对华人的暴乱，大量华人资本逃离印尼，据估计数目达1000亿美元。印尼的银行大多都关门歇业、合并或准备变卖。对它们的整顿将要花费700至800亿美元。负债累累的印

尼企业几乎都处于破产的状况。已经宣布的在能源、通信、交通、零售等部门要进行的改革也踏步不前。印度尼西亚欠债很多,据说达 2250 亿美元,为了应付预算开支,还需要大量资金。

在政治上,瓦希德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联合政府,副总统梅加瓦蒂的民主斗争党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在议会中,瓦希德的党不拥有多数,失去政权的专业集团党仍然有巨大的力量。瓦希德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低调和妥协姿态;而且,瓦希德还面临着清算苏哈托和苏哈托家族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政治较量一直十分激烈。更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地区分离主义。自东帝汶去年赢得独立以来,亚齐特区和伊里安查亚省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瓦希德处在要求民主解决和军事镇压的夹缝之中。这个问题在瓦希德的政治日程表上,有头等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心岛与其他岛之间的权力关系必须改变,如果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如何重新摆正军队的位置是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苏哈托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军队居于政权的中心位置。苏哈托的倒台意味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利益集团和最有权势的力量,军队改革是一项具有爆炸性的工作。瓦希德上台不久,媒体就不断盛传军队政变的消息。尽管军队不再干预印尼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纠纷,警察承担了维持法制与秩序的主要责任,但正如一位驻东帝汶的联合国官员说:“小鸡煽动一下翅膀,警察都会逃之夭夭。”随着军队的部分指挥和控制体系失去作用,个别指挥官开始无视法制与秩序;几乎同犯罪集团无异的伞兵部队在填补动荡地区的权力真空。一些军饷少得可怜的士兵一直在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角色,他们被政治反对派收买以帮助反对派动摇瓦希德政府的地位。

另外,瓦希德政府还受到了丑闻的困扰。据报道,瓦希德总

统的一名按摩师以总统“私人助理”的名义向后勤事务局所属的一个基金会索要 350 亿印尼盾(约合 437 万美元),用于对亚齐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该按摩师是持有他自己签字的国务秘书处的信件拿到这笔钱的。事发后该按摩师已潜逃,但总统的一些亲信被某些人指控接受了其中部分款项,一时间总统周围的人,甚至总统本人大搞贪污、串通和裙带风的传闻四起。

因此可以说,瓦希德面对的国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在他当选不久,我在一篇分析中就指出,瓦希德坐在火山口上,现在看来,这个判断仍然正确。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瓦希德丧失执政地位。2000 年 8 月,瓦希德就面临着议会对他进行弹劾的可能。四面楚歌的瓦希德总统在向人民协商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低声下气地承认“有缺点”,“软弱”。据说人们对瓦希德的强烈不满包括不称职、腐败和执政方式反复无常,许多过去支持他的人威胁要加强对他的控制,或者弹劾他。但是,弹劾并没有真正发生。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对瓦希德总统,我们怀有极大的敬意和同情。每当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们都受到某种冲击。总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在印尼这样的国家当总统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应当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他用他的病弱之躯来承担重建国家的责任。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印尼的情况,确实处在统治危机的局面下。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即使换一位领导者,情况也不可能更好。苏哈托式的强权人物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否就会更好一些呢?我的回答是不会,那只会使情况更糟。印尼军队中,肯定不乏那类人物,但他们是否有信心有能力挽救国家呢?我相信他们肯定认识到,靠军事强权无法化解危机,充其量只能推迟危机的总爆发。弹劾瓦希德的要求

为什么得不到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的支持？为什么甚至他的最严厉的批评者最后都不赞成弹劾？我想，原因就是他们都看到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党派分歧。就连强烈要求将瓦希德赶下台的政治家也不想对可能出现的爆炸后果承担责任，这个后果包括在瓦希德的根据地、人口最多的爪哇岛上引起大规模骚乱，这是印尼少数几个未曾出现过大规模社区暴乱事件的岛屿之一。雅加达头脑较冷静的人也基本上认识到，眼下没有人能替代瓦希德。

因此，瓦希德变成了某种象征，他的病弱和妥协成了时势艰难的象征。

瓦希德所面对的问题的实质，可以这样概括：首先，苏哈托政权瓦解后，出现了几个竞争性的政党，他们势均力敌，瓦希德只有与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就任伊始组成的所谓“团结内阁”，实际上是个照顾内阁，缺乏基本共识，行政能力有限。在议会中他也受制于其他势力。其次，在持续了几十年的强权造成的废墟上进行国家重建的努力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苏哈托的统治在人民的意识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一切都要依靠强权，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政党的活动都要以强权为后盾，人们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而当这个无处不在的强权突然丧失尊严后，人们觉得似乎可以自行其是了。民主化在使人们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解放了人们的期望，而政府却不能一下子满足这些相互矛盾的期望，期望就变成了失望，人们变得愤怒起来，于是统治变得困难了。第三，新的民主政权、社会的民主化与强权后遗症形成的综合危机结合，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社会、国家现有的机构无法处理呈爆炸性涌现的信息。社会高度复杂化了，而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却在信息冲击下陷于瘫痪。第四，政治透明度增加了，以前，政治运作被各种屏障遮挡着，人

民没有知情权,媒体也处在严格管束之下;而现在,政治反对派变得十分活跃,媒体获得了批评的权力。

因此可以认为,印尼的统治危机是民主转型期的危机。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一危机不只是瓦希德本人的领导能力的危机,而是可以称之为“复杂性导致的国家危机”。对这种危机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多种问题在同一时间出现而造成政治机构无法适应而形成的危机。这当然也是统治危机。处在这种危机之下的领导人,需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才能不被“火山”吞没。

菲律宾:弹劾引发政治危机

对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弹劾审判 12 月 7 日正式开始。对一位现任领导人采取这样的行动,在亚洲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于这里盛行的政治文化而言,这种对待领导人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弹劾还伴随着传统的街头示威,规模动辄数十万人,据说,仅 12 月 7 日那一天,要求总统下台的组织就举行了二十多万人的游行示威。

因此毫无疑问,围绕对总统的弹劾在菲律宾已经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从今年十月份开始以来,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除了政治上的斗争,众议院的调查,不断揪出腐败分子,菲律宾媒体掀起了大规模的揭丑运动,实际上,从媒体的角度,总统已经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总统已丧失了执政的民意基础,现在的审判只是一种体制上的需要。即使说最终总统被判无罪,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折腾,总统的执政能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因此,发生在菲律宾的事情,确实是一次统治危机,如果考虑到发生在印尼、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弹劾事件

(有的只是动议而没有进入实施程序),我们甚至可以说,东亚正在面对带有普遍性的领导人危机。

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 1998 年 6 月就任总统,此前他是一位受欢迎的电影明星。他就任总统的时候,整个东南亚正经受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在国民的期待中,他承担着带领菲律宾走出危机的责任。他在竞选中打的旗号也是反对腐败和进行改革。然而,两年来,他的行为向国民显示,他似乎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甚至也没有显示有这样的责任感。围绕着他的弹劾,媒体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贪财爱色、拿国事当儿戏的“混世昏君”。

事情起因于菲律宾警方的一次“打赌”行动。菲律宾警方在中南部伊罗戈省的打赌搜捕中,缴获了一个小蓝本,上面记载着为他们的赌博提供保护的 121 名官员名单,这些官员都收取了赌博集团贿赂的数量不等的保护费,其中包括国会议员、法官、检查官,还有副省长、市长、副市长,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警察局、消防局、交通局、内政部、毒品管理局的一些官员也“榜上有名”。赌博集团每月向这些官员提供 400 万比索的保护费,几年来赌博集团在这些人身上总共花费了上亿比索的保护费。丑闻曝光后,在各界的压力下,最后挖出了这幕丑闻的真正靠山原来是该省省长辛森。后者后来供认,其实,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就是当朝总统埃斯特拉达。他透漏,他每月付给总统 1000 万比索,几年来总共付给总统 4 亿比索(约 850 万美元)。辛森的揭发立即引发了菲律宾政坛的一场世纪大地震。

这场地震开启了揭露总统丑闻的运动。有关总统的各种密闻被不断挖出,总统原来的政治盟友不断出来揭发总统的种种逸事。比如,埃斯特拉达内阁的原建屋部长出来说,总统是一位非常讲究吃喝的人,他经常在餐桌上处理政务,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讨论国家大事、审批报告。他的盟友还透漏,总统有很多情

妇,而且为他的这些情妇购置了豪华的别墅,经常带着他的女朋友出席宴会。内阁的一位要员对新闻界说,他们曾请总统的一位有一定政治头脑的情妇吃饭,希望她劝说总统收敛一些:“如果总统继续豪赌狂饮至深夜,并且为多位情妇兴建豪华别墅,这种行径在政治上就是自取灭亡”。

菲律宾众议院 11 月 6 日审查了对总统弹劾的几项指控,并且得到了通过,这些罪名包括:

受贿:根据辛森的揭发,从 1998 年 11 月到 2000 年 8 月,每月从非法赌场经营者那里收取 1000 万比索;

伪证罪:对自己的财产作了不实申报;

背叛了公众信任:利用总统特权为自己的朋友谋取生意上的好处;

违反宪法。

菲律宾参议院就是根据上述指控展开弹劾审判的。上述罪名只要有一项成立,他就会被宣判有罪,从而被赶下总统宝座。弹劾的法律程序要持续一个多月,对于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而埃斯特拉达走到这一步,确实有深入思考的必要。

从菲律宾参议院指控的罪名来看,埃斯特拉达的问题,是亚洲国家领导人最常碰到的,即所谓的大搞裙带关系和道德败坏。这些国家领导人有强烈的动机利用权力为找上门来要求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也许,这些领导人在运用权力“推动”某个项目的通过时,内心里是抱着发展经济的目的,认为自己是运用自己的影响作好事,当他推动的确实是好事时,不少人可能说,他是一位好领导,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人,他自己也以此自得。然而,领导人往往处于被动的和信息有限的地位,找上门来的人可能是“黑帮”,而更多的是自己的家族关系和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推动的好人好项目被忘记了,坏事坏人被曝了光。假如

后者没有被曝光,这位领导人就将以开明领袖名垂青史。这种对开明领袖的向往和对这种行为的宽容是东亚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然而我们一再看到,“好领导”是靠不住的,领导人并不具有特别的才能辨别是非、好坏。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要低于普通人。一个在自己家族内和朋友圈内有“好”名声的领导人,更有可能是一个“背叛公众信任”的人。比如苏哈托,我想他大概算得上是一位慈父,下台前也以“开发之父”为人称道,然而,事实是,他严重背叛了公众信任,他把国家搞成了家族公司。埃斯特拉达也是如此,他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谋取了很多好处。当然他肯定推动过不少好的干净的项目,假如不是因为他推动了“黑帮”的赌场,也许就不会出问题。但是,亚洲经济危机以来,这种对开明领袖的期望,这种朋党资本主义的路线,已经无法再继续了。目前的领导人危机或许就是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危机。东亚政治处在转型中。

再说道德问题。埃斯特拉达是电影明星出身,自然有魅力,我想,在竞选中关于他的道德问题,就有所披露,而他之所以当选,说明人们对于道德问题有相当大的宽容度。但是,一个明星的道德和一个政治家的道德,是不一样的,正如一个明星的表演和一个政治家的表演不一样那样。在目前的时代氛围里,人们未必会用清教徒的道德标准要求一位政治领导人。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像明星一样耽于声色,人们自然有理由担心,他能严肃对待公众信任吗?政治领袖是一种“钻硬木”的工作(马克斯·韦伯语),流于表演的人不可能做好,因此确实有一种特别的自我约束要求,这是一项伴之以严谨道德伦理要求的职业。然而,我们看到,埃斯特拉达在总统的位置上,还像演电影那样。竟有那么多情妇,而且那么公开地活动,其内阁成员甚至要通过总统